

先秦货币文构形无理性 趋向研究

陶霞波 著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先秦货币文构形无理性 趋向研究

陶霞波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先秦貨幣文構形無理性趨向研究/陶霞波著.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6. 12

(上海市社會科學博士文庫)

ISBN 7-309-05356-7

I. 先… II. 陶… III. 古貨幣文字-研究-中國-先秦時代 IV. K877.9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04395 號

先秦貨幣文構形無理性趨向研究

陶霞波 著

出版發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郵編 200433
86-21-65642857(門市零售)
86-21-65118853(團體訂購) 86-21-65109143(外埠郵購)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責任編輯 韓結根
總編輯 高若海
出品人 賀聖遂

印刷 上海肖華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960 1/16
印張 30.75
字數 457 千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309-05356-7/H·1072
定價 48.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向復旦大學出版社發行部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内 容 提 要

文字体态的剧烈变异实质上是古文字原有的构形理据受到巨大挑战的结果——由于文字使用层面的扩散，书写物质材料的丰富，日常书写性倾向的锐化，汉字秉承图画文字而来的随体诘屈、以形表意的理据性构形特点逐渐遭到破坏、消解，以至最终失落，作者将构字理据的这一丧失过程在文字形体上的表现称为“构形的无理性趋向”。出自民间匠人之手的先秦货币文，因其“古奥诡谲”、“繁简巨变”、“草率急就”而成为这一特征最有力的诠释者。本书以此为切入点，在对983种（枚）先秦货币上集得的7136个货币文原形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已有的考释研究成果和现代信息技术，并与相关文字类型进行比较，归纳出货币文形体变异的若干特征，选取“直线化”、“轮廓化”、“借用”、“十以上数字文字表示法”、“传形”等方面作专题研究，从书写的材质、方式、心理等角度对货币文构形无理性趋向的因和果展开多维探讨，探索出汉字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序

我們曾經在有關場合表述過：各種材料類型的古文字字符構造使用，都有各自的一些屬性特點。例如同樣一個字符，在金文裏標示的是一種功能，到了貨幣文、璽印文、簡帛文裏，有時候就標示跟在金文裏所標示的完全不對應的另外一種功能。反過來，同樣的結構功能，也允許不同的結構成分來呈現，例如《說文解字》中著錄的上千個包括古籀文字在內的重文，大部分都是由於字符偏旁的替換而形成的。要是這種“自成系統”的情形佔到了一定比例，各種材料類型古文字都具有自己的字符“使用天地”，各種材料類型古文字，都由於自身的載體、書體乃至結體等因素而形成各自的個性，對整個文字系統的認識就構成嚴重障礙。商代甲骨文的字符，有些到了周金文就是另外一回事；金文的字符有些到了古璽印文字又具有了其他的功能。同樣，在古陶文裏跟古幣文相同的字符，其實完全是具有其他功能的字符。尤其是戰國文字，這樣不對應的構造情形並不是很少見的。因此，識別和處理古文字形體，就不可能拿戰國楚簡的文字形體去簡單對應先秦的其他類型的古文字，也不可能拿戰國其他文字類型的基本字符去機械對應楚系文字。

基於上述，我們知道，相對於其他各種材料類型的古文字材料，先秦貨幣文字研究局限很大：既有語料層面上的問題，又有構造層面上的問題。所謂“創新性”的學術研究，主要是要看能否針對特定研究對象，選擇與之相適應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陶霞波博士的古幣文研究學位論文在本領域作出了自己的實際貢獻。作者根據相對缺少理據可尋或者說尋找起來更加困難的材料類型，從文字使用的實際狀況出發，在充分利用現有的考釋研究成果和結構研究的理論上，通過字形本體的研究把握貨幣文字系統的總體特

徵，並嘗試從文字外在的生存環境來探尋文字形體的成因，揭示先秦貨幣文字構形的“無理性趨向”，為漢字構形研究補充了新的視角，從而在一定範圍內豐富了漢字構形理論。論文中所謂“無理性”定義，是相對於漢字構形的理據性而言。構形的“無理性”是指在書寫過程中漢字構形理據的破壞，在文字體態上表現為屈從於書寫的傾向以及在此傾向下發生的變異，在漢字發展早期表現為漢字擺脫圖畫軌跡而向符號化邁進的一種自覺。通過對貨幣文字構形現象的梳理與歸納，論文的調查研究結論，是符合研究對象實際的。

陶霞波博士論文材料的選擇和研究的方法是從書寫活動與文字形體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一角度出發，通過探討先秦貨幣文中“構形無理性趨向”的種種表現，呈現漢字發展過程中形體演變的某些規律。從現有的資料貯存情況來看，先秦貨幣文的字料一是以字彙的形式出現，一是在貨幣拓片收集中一並著錄。根據本文的研究目標，作者選擇後者作為字料來源。《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成書時代最晚，材料收集最新，文字著錄最富，成為本文研究所用的主要文字材料。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建立了先秦貨幣文資訊語料庫，最大限度地佔有材料。論文基本是在兩個層次上展開：一是在貨幣文內部系統進行窮盡性的調查研究，一是與兩周金文尤其是戰國文字的對比研究。從研究工作以及研究過程中所貫徹的方法思路來看，本文對文字類型學構形學理論也有一定補充意義。

陶霞波博士從攻讀碩士學位階段就在劉志基教授的悉心指導下，有志於古幣文的調查研究工作，建立專家資料庫，打下堅實的研究基礎。經過數年積累，迎難而進，不屑去作那種“研究史”式的空泛之論，在古幣文這一相對冷僻的專業領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陶霞波博士一個突出特點是善於沉潛思考，平心靜氣，追根尋末，溯源明流。在普遍心粗氣浮、華而不實、眼高手低、甚至不知高低的氛圍裏，這種思維品質，也許比某些所謂的學術成就更加重要。基於此，我們有理由期待作者在古文字學研究領域裏更進一竿。在陶霞波博士學位論文即將付梓之際，為作者高興之餘，想到了上面的幾點聯係，也算是序。

本書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專案編號：05JJD740008）系列成果之一。

臧克和

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2006年元旦

目 錄

緒 論	1
一、研究材料和研究現狀	1
二、材料特點和研究角度的確立	3
三、材料選用和研究方法	6
附表1：定釋字字形單位（單字）表	11
附表2：定釋字字形單位（合文）表	14
附表3：歧釋字字形單位表	15
附表4：構件及所構字形單位表	17
第一章 直綫化	24
一、先秦貨幣文直綫化的概況	25
二、從“陽（易）”之“日”符看直綫化的演變過程	27
三、與兩周金文的比較	33
附表：先秦貨幣“陽”字錢文一覽表	39
第二章 輪廓化	42
一、先秦貨幣文輪廓化的概況	43
二、輪廓化對象的參差性	45
三、輪廓化手段的多樣性	47
四、對輪廓化構字的再思考	63
第三章 借用	68
一、構字元素的借用	68
二、非構字元素的借用	83
三、與戰國金文的比較	89
第四章 十以上數字的文字表示法	97
一、先秦貨幣文中的十以上數詞	97

二、甲金文字中的數字合文	107
三、貨幣文對傳統數詞記錄法的突破	114
附表1：金文十以上數字辭例總表	120
附表2：十以上數字表示法在金文中的年代分佈	142
第五章 傳形	143
一、“傳形”界說	143
二、“傳形”調查	145
三、“傳形”與貨幣文書寫方式	151
四、“傳形”與標記性語境	159
附 錄	167
參考文獻	476

緒論

一、研究材料和研究現狀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先秦貨幣文字。它是指“鑄或刻寫在先秦貨幣實物上的文字（這些實物質地包括銅、錫、鉛、金、銀、玉、布帛等），屬於中國古文字中的一個分支，時代跨越兩周”^[1]。根據目前所見的材料，春秋以降的空首布上已經模鑄有簡單的文字符號，但以戰國貨幣上出現的文字居多，古文字學界故將貨幣文納入戰國文字研究的範疇。因此從漢字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本書是對古文字階段某一類型文字的斷代研究。

根據學術界對古文字的斷代研究，殷商文字、西周文字^[2]、戰國文字，是古文字學發展史中的三個重要階段。由於戰國文字呈現的是古文字發展晚期的書寫形式，故其在漢字發展史上處於古今文字啓承轉接的歷史地位。儘管戰國文字的首次發現早在西漢前期，但是由於文獻的亡佚，材料的限制，研究力量的單薄，戰國文字的研究長期以來只是金石學的附庸，未能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視；建國以來，隨著戰國文字原始材料的大量出土，戰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重要性日益凸現，戰國文字研究逐步發展成爲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但是相對於甲骨、金文兩類大宗文字材料的研究狀況和成果而言，無論是研究的廣度、力度還是

[1] 黃錫全《先秦貨幣研究》，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38頁。

[2] 春秋金文作爲西周與戰國之間的過渡文字類型，往往爲西周金文的研究所涵蓋

深度，都還無法與之相提並論^[1]。而先秦貨幣文作為林林總總、名目繁雜的戰國文字一支，其本體研究更是處於弱勢狀態：

一、論著方面^[2]。從研究的歷史來看，人們對於貨幣文字的認識早於先秦貨幣，但是由於文字與其載體密不可分的關係，前人對貨幣文字的研究首先源於著錄先秦古幣的需要，反映在研究成果上，主要是以編撰資料性工具書為主，比如古代的錢譜、近代丁福保的《古錢大辭典》、現代汪慶正主編的《中國歷代錢幣大系·先秦貨幣》、朱活等編寫的《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皆以收錄拓片為主，簡明釋讀文字為輔；又或是在貨幣史論方面的研究中兼以文字的考釋為某一研究手段或研究途徑，如王毓銓的《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鄭家相的《中國古代貨幣發展史》、王獻唐的《中國古代貨幣通論》、黃錫全的《先秦貨幣通論》和《先秦貨幣研究》；而文字本體的研究，最早出現在宋代洪遵編寫的《泉志》，後有馬昂的《貨幣文字考》、商承祚、王貴忱、譚棣華合著的《先秦貨幣文編》、張頌的《古幣文編》是目前僅有的兩部貨幣文字字典^[3]，成書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何琳儀的《古幣叢考》是目前唯一的一部集中反映貨幣文字考釋成果的論文集。

二、論文方面。就我們所收集的建國以後至2004年底國內主要刊物發表的貨幣相關文章來看，內容上大致可分作用於新材料發表的考古挖掘報告、結合貨幣物理屬性、考古屬性的綜合性文化研究、對貨幣鑄造工藝及其歷史發展的探討和介紹，以及文字學界對錢文的釋讀和研究。從數量上看，關於錢文的研究僅佔14%^[4]。

[1] 關於戰國文字發現和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及其評價，在《戰國文字通論(訂補)》的第一章中有詳細的介紹和論述；與甲骨、金文研究狀況的對比，亦可參看該書的“餘論”部分，此處不再贅述。

[2] 關於先秦貨幣方面的論著介紹及評價，詳見《戰國文字通論(訂補)》第一章相關內容。另外，董蓮池《二十世紀中國學者的戰國文字研究》(《古漢語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中對二十世紀的貨幣文研究資料也進行了分類綜述。

[3] 吳良寶先生新作《先秦貨幣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之時，本書已經完稿，惜未能吸收其研究成果。

[4] 截至2004年底我們所收集的貨幣相關論文共364篇，其中屬於新材料發表類的155篇，屬貨幣文化研究類的133篇，屬錢文考釋類的51篇，屬鑄造工藝類的25篇。《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文後亦附有“錢幣專著”和“錢幣論文”(大陸論著目錄)的目錄索引，其中論文收集的年限下至2000年底，可參看。

作為綜合性的歷史文化信息載體，先秦貨幣本身就具有多維研究的價值和需要，而貨幣上的文字只是貨幣研究的一個方面；且在服務於貨幣研究的大前提下，文字研究也往往注重於從文物考古、歷史文化和文獻內容等角度的切入和開展，文字學意義上的文字本體研究則側重於單字考釋和字彙編撰，對於文字形體的考察或是散見於其他類型文字材料的對比研究中，例如《戰國文字通論》中的部分章節；或是僅作現象描述，舉例印證，如黃錫全的《先秦貨幣文字形體特徵舉例》；至於從漢字發展史的角度對文字構形系統、形體特點、演變規律的研究目前還不是主導性的。而研究只做個案分析，固然有單字釋讀上的突破，但是較為孤立零散；缺乏系統意義上的考察，則不能把握字形演變的規律；不把研究的視野拓寬到文字生存的物質環境，就無法抓住先秦貨幣文字形的個性特點，也就無法為其在漢字發展史上找到合理的定位。

二、材料特點和研究角度的確立

一直以來，研究者在提及貨幣文字時常常作“古奧詭譎”、“繁簡巨變”、“草率急就”等諸如此類的形容。然而如何“古奧”、如何“詭譎”、“繁簡巨變”的程度又是如何，又何以會“草率急就”？在標榜“文字異形”的戰國時代，貨幣文的“異形”有何與眾不同之處，“異形”的根源何在？如此等等問題，目前學術界還缺乏嚴密翔實的定性研究或是科學可靠的定量分析。探其客觀原因可能在於材料的零碎難檢，加之手工操作的落後，傳統的研究一般只能停留在資料的收集整理層面，簡單的堆砌阻礙了對材料之間內部關係的揭示，無法深刻地掌握材料的價值，認識的不足導致了對材料運用的局限；而其根本原因則在於研究角度的選擇偏離了材料本身的特點。

以字形研究為中心的漢字學中，傳統六書理論以其深厚的基礎以及長期的歷史積澱，在漢字構形上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成果；而現代

“字素理論^[1]”、“漢字構形學^[2]”等理論的提出和建構不僅為漢字形體的研究確立了明確的目標，還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實踐模式。但是這些理論的運用對象多以單純規整、考釋充分、理據明確的古文字類型為主，比如“字素理論”主要以甲骨文為分析對象，而“漢字構形學”的驗證也是從《說文》小篆開始的。這些文字類型處於漢字古文字階段的正統的、主流的地位，但不能涵蓋所有文字材料。“異形”雜陳的戰國時代，文字的效用功能、文字的使用者、文字的書寫材質、文字的書寫方式，以及最終呈現的文字體貌，都獲得了極大的豐富，不復以往的單純——正統文字系統的理據性在此時受到了巨大的挑戰，文字構形系統內部出現了較為激烈的調整和平衡。這一時期湧現的大量俗體文字在文字體態^[3]上充分演繹了這些衝突。而出自民間匠人之手的先秦貨幣文，正是春秋戰國時代俗體文字的主要代表，它的“古奧詭譎”、它的“繁簡巨變”、它的“草率急就”充分地再現了漢字進入世俗層面後的使用情況。

而對如此“複雜”的文字材料，本書從文字存在的實際狀況出發，在充分利用現有的考釋研究成果和結構研究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字形本體的研究把握貨幣文字的總體特徵，並嘗試從文字外在的生存環境來探尋文字形體的成因，希望以此拋磚引玉式

[1] “字素理論”由李圃提出。詳見李圃《甲骨文文字學》，學林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李圃《字素理論及其在漢字分析中的應用》，《學術研究》2000年第4期。該理論“是將構成漢字形與音義相統一的最小的結構要素稱為字素。字素在造字的動態系統與析字的靜態系統中有不同的特性。漢字的造字過程經歷兩個階段，一是以語素為出發點去取象造字階段，二是以語素為歸著點憑藉成字向語素回歸階段。前一階段形成多種造字法，後一階段形成多種表示法。”（張曉明《二十世紀漢字字形結構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5期）

[2] “漢字構形學”由王寧提出。詳見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王寧《系統論與漢字構形學的創建》（《暨南學報》2000年第2期）。該理論認為：“在其時歷史層面的漢字總體，有自己的構形元素。這些元素有自己的組合層次與組合模式；漢字的個體字符是互相關聯的、內部呈有序性的符號系統。漢字構形學為各個歷史層面上漢字構形系統的描寫和歷時層面上漢字構形不同系統的比較服務，為之建立基礎的理論與可操作的方法。”

[3] 劉志基《漢字體態論》（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中對“漢字體態”作了如下界說：“所謂‘漢字體態’，實指漢字的視覺形態。此種視覺形態，並不僅指單個文字的構形，而包括與文字製度——文字記錄語言方式系統相對應的所有文字的直觀形態。”

的研究為以後的漢字構形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豐富漢字構形理論。

以往的研究無論是強調以漢字的形體為本位^[1]，還是強調在漢字和漢語的指涉關係中研究漢字的形體，關注漢字形音義三方面的關係^[2]，都不太注重文字的生存環境對文字形體的影響。所幸時下在對春秋戰國時期文字異形現象的考察中，已有學者注意到文字使用層面的擴散，書寫物質材料的豐富，日常書寫傾向的銳化才是這一場變革的主要推動者^[3]。應該說，戰國時代文字生存環境的變更遠較文字體態的地域性歧異來得本質而深刻。同樣的，我們認為先秦貨幣文的複雜多變也根源於書寫活動中諸多因素的變異，這種變異訴諸文字實體則表現為文字構形的演變趨向無理性一極。

所謂的“無理性”是相對於漢字構形的理據性而言的。我們之所以稱之為“趨向”是因為漢字構形理據的破壞和喪失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這一過程在文字體態上表現為屈從於書寫性的傾向以及在此傾向向下發生的變異。“書寫性傾向”在漢字發展早期表現為漢字擺脫圖畫軌跡轉而向符號化邁進的一種自覺。而當早期文字走下神壇，投入到嶄新的文字應用天地時，書寫活動的日常性、世俗性一躍成為文字形體變異不可避免的推動力。構形理據在個人書寫風格的張揚和追求書寫效率的壓迫下極度失落。通過對貨幣文字構形現象的梳理與歸納，不難發現：結構的理據性與書寫的無理性之間的矛盾在鑄幣工匠的筆下突顯出來，隨意恣肆、變化萬千的貨幣文字淋漓盡致的詮釋了書寫性傾向對文字結構理性的擠壓以及書寫性變異對文字體態的重塑，表明了在漢字發展史上，文字構形在以書寫方為主導的書寫活動中屈從於書寫壓力而呈現無理性發展的趨勢。

[1]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講中提到：“音和義都是漢字作為漢語的載體由漢語那兒承襲而來，只有字形是漢字的本體。”

[2] 詳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1頁。

[3] 詳參劉志基《漢字體態論》，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300頁。

三、材料選用和研究方法

本書是從書寫活動與文字形體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一角度出發，通過探討先秦貨幣文文字構形無理性趨向的種種表現，探求在漢字發展過程中形體演變的某些規律，以期對漢字學研究的視野和方式有所拓寬和補充。由於書寫活動乃是一種暫時性的行爲，古今相隔，當時的情形我們已無從知曉，而唯有文字穿越了時空，保持着原初的風貌，因此目前所見貨幣文的字形即爲本書研究之基礎材料。而文字所在之貨幣，作爲載體也因間接保留了書寫過程中的相關信息而顯得至爲重要，因此也納入我們的研究視域，成爲研究之輔助材料。從現有的資料性研究情況來看，先秦貨幣文的字料一是以字彙的形式出現，一是在貨幣拓片收集中一並著錄。鑒於本書的研究目標，我們選擇後者作爲字料來源。這一類資料的集成性文獻，目前主要有丁福保的《古錢大辭典》（1938）、汪慶正主編的《中國歷代錢幣大系·先秦貨幣》（1988）以及朱活等編寫的《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1995）三部，其中以《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成書時代最晚，材料收集最新，文字著錄最豐，成爲本書研究所用文字材料的主要來源；同時參考《中國歷代錢幣大系·先秦貨幣》，相應地補入一些拓片和字形。此外，歷年發表的考古新發現，亦間或有貨幣及其文字的發掘報告，也進行了選擇性的收錄，材料收錄的年限爲2004年底。

由於本書的研究是基於文字形體的考辨，因此除了實物資料的搜集之外，還需關注學術界對於貨幣文字最新的考釋、研究成果。一般說來，在進行貨幣拓片著錄的同時必須對其上文字進行辨識，因此著錄實物拓片的過程也包含了文字考釋工作，故而在實物資料收集中已經完成了部分考釋研究資料的收集工作。另外，錢文考釋往往是貨幣研究的基礎，因此，與貨幣相關問題研究的論著中時常伴有學者釋讀錢文的真知灼見，諸如王獻唐的《中國古代貨幣通攷》、黃錫全的《先秦貨幣研究》、《先秦貨幣通論》等等。何琳儀的《古幣叢考》專收錢文考釋論文25篇，是目前僅見的幣文考釋專著，上個世紀末何

先生編著的《戰國古文字典》中，亦有對貨幣文的收錄和考釋。除此之外，我們也注重收集以單篇論文形式發表於國內各主要刊物上的考釋研究文章。

鑒於以往傳統手工操作方式的局限，也鑒於運用計算機手段進行資料搜集、字形整理、數據統計已成為日前漢字研究的主要模式，因此本書在研究過程中全面引入了現代化信息處理技術，建立了先秦貨幣文信息語料庫^[1]，以最大限度地佔有材料，確保研究結果的科學可靠。該語料庫以錢文和貨幣形制的異同作為唯一記錄的標準，收錄先秦貨幣983種（枚）^[2]，其中始鑄於春秋時期的有文錢幣573種（枚），集中鑄行於戰國時期的有478種（枚）；共得貨幣字形7136個^[3]（去除模糊不清，殘缺隕泐者）。根據現有的考釋研究，這些字形的釋讀情況大致可分為：一是形音義明確，考釋基本有定論；二是形、音明確，但是意義不明，如早期空首布上的單個文字符號；三是構形明確，但音義考釋尚有分歧，如布幣“魯陽”，從字形來看應隸定作“盧”，但有說通作“虞”的，或說作“廡”，讀作“魯”的；四是意義用法明確，但字形字音不明，如布幣“𠄎二鉞”，根據辭例推斷“𠄎”當為地名用字，至於是為何字，尚無定論；五是形音義的考釋尚無定論的；六是沒有考釋的，這一類字多見於刀幣的幕文。由於我們所作的是字形研究，因此研究所需的字料應選擇形音義明確的“定釋字”，但是貨幣文是一種字形高度變異的文字材料，而我們又以“變異”為研究重點，故而屬於第二種情形的字料也基本納入“定釋字”的範疇，第三、四、五三種情況我們看作“歧釋字”，在具體研究中我們根據實際的需要加以選用。而最後一種情況我們看作“無釋字”，這類文字材料一般不用

[1] 該資料庫為國家教育部重點學科項目“出土古文字電腦全息檢索系統”的子課題，歷時兩年，現已完成數據庫的建設和字庫的建立，部分成果（楚文字）收入《戰國古文字數字化處理系統》（光盤），此光盤於2004年3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2] 語料庫中收錄的自殷商始至秦統一共計貨幣約有1025種，其中無文42種，而文不清的18種。貨幣係批量生產之物，且多為窖藏，歷代錢譜所載先秦貨幣非科學挖掘，因此對貨幣文字做窮盡性的收集理論上可行，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是無法實現的。在此我們以《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所給出的貨幣分類為主要參考依據。

[3] 由於本書所作的字形研究往往要牽涉到字形中筆勢的差異，因此在原形字樣的挑選原則較為寬泛，兼顧結構和筆勢的同時還要依據文字所在貨幣的考古屬性。

作研究。相對於“無釋字”，“歧釋字”和“定釋字”可被通稱作“已釋字”。

基於現有的考釋研究，我們對所有材料範圍內的貨幣文字字形作了清理。根據我們的統計，7136個字形中，“定釋字”形以及構形明確者有5473個（詳見附錄：定釋字字形總表），涉及字形單位^[1]391個（見附表1），其中合文62個（見附表2）；“歧釋字”形有925個（詳見附錄：歧釋字字形總表），涉及字形單位約有239個^[2]（見附表3）；“無釋字”形有736個（詳見附錄：無釋字字形總表）。

在定釋字範圍內，我們對可分析字形的原形字做了自然結構的拆分，共得基礎構件225個（見附表4）。據有關學者的研究統計，甲骨文字系統的構件為378個（根據李圃先生的《甲骨文字學》，對一千多個已被釋出的甲骨文進行拆分而得），而金文為404個（資料由張再興的《西周金文文字系統論》提供），總體上漢字的構件約在400個左右，每個階段略有起伏，但不出此範圍。然而先秦貨幣文中可分析的基礎構件數不及甲金文字的60%。基礎構件量的減少折射出貨幣文字形體因理據性的喪失而導致結構的不可拆分性，同時也表明先秦貨幣文不是一個自足的文字體系。後者結合其記錄語言的內容來看更為鮮明。在已釋字範圍內，結合貨幣的辭例，我們對語言功能明確的4695個原形字進行詞類劃分，以明確貨幣文所紀錄的語言系統。

[1] 所謂的“字形單位”，“是指具有特定結構（包括文字學意義上的表詞結構和書法意義上的自然結構）的字形種類，它不同於字，因為字可能包括若干不同結構的字形；它也不同於只存在筆勢差異的異寫字（一個字的每一個具體的原形字都屬這樣的異寫字），所以它應該是不計筆勢差異的隸定字。”（劉志基《說楚簡帛文字中的“六”及其相關字》，《中國文字研究》2004年第11期，第150頁）在這裡我們對異構現象作了區別，對於能夠隸定的字形給出隸古定的楷書字形，以“通用楷書字頭+（隸古定字形）”的形式表示，如“陰”，貨幣文中有從阜從金者，隸古定作“陰”，具有該構形的字形對應的字形單位表示為“陰（陰）”；對於目前尚無法隸定的字，我們以“通用楷書字頭+數字”以示區別。諸如“兩”，在貨幣文中有兩種構形：一作“𠄎”，一作“𠄎”，前者標示為“兩”，後者標示為“兩1”。此部分字形請參看附錄：定釋字字形總表。

[2] 此處字頭的統計是根據一種考釋意見確立的字頭進行的。